

来自历史的遗产：对外开放对城市创业活动的影响(1842—2013)*

杨 嬛 张心宁 王 哲

内容提要：在当前“逆全球化”和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以史为鉴，研究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中国近代口岸开埠的准自然实验，以地区创业活动作为经济发展研究的切入点，利用近代海关(1842—1912 年)、近代创业(1842—1927 年)和现代创业(2004—2013 年)数据，在一个跨越百年的视角下研究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活动所带来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扩散路径和形成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一百多年前近代口岸的开埠显著促进了近代和现代地区创业活动的发展，并对口岸腹地存在一定的溢出效应，而创业文化和人力资本是地区开放产生长期影响的主要作用机制。这一结论从历史视角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区发展战略等开放性政策对中国区域发展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

关键词：近代开埠口岸 创业活动 溢出效应 创业文化 人力资本

作者简介：杨 嬛，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433；

张心宁(通讯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博士，200433；

王 哲，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200433。

中图分类号：F1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3)02-0137-17

一、引言

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转型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带动下，40 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增长 30 余倍，进出口和 FDI 都获得了量的飞跃和质的提升。而事实上，对外开放对国家和地区产生的深远影响远不止于此。Acemoglu 等(2005)就曾揭示 16 世纪以来西欧部分地区的对外开放不仅带来了贸易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通过促进商人阶级

*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进一步优化上海创新创业环境研究——基于城市文化与城市创业活动的研究”(2018BJB018)；上海财经大学国家级课题后续研究项目“城市文化环境与企业创业研究”(2018110493)；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穷则生变’：历史农业自然禀赋对地区现代创业活动的影响”(CXJJ-2021-438)。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张心宁电子邮箱：zhang.xinning@163.sufe.edu.cn。

的崛起,引发了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并对开放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长期的影响。但当前针对中国的研究仍主要着眼于开放对经济发展的短期影响方面(Alder等,2016),鲜有研究放眼历史,对开放的长期影响进行跟踪和剖析。基于此,本文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作为准自然实验,以地区的创业活动作为经济发展研究的切入点,在一个跨越百年的视角下研究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活动所带来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扩散路径和形成的内在机理。在当前受到“逆全球化”和新冠疫情冲击而矛盾重重的国际环境中,本文对理解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和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长期以来,地区创业活动被认为是创造就业岗位、刺激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力推手(李宏彬等,2009)。2020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指出强化创业带动就业,放大创业能够产生的倍增效应。然而,地区创业活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较为显著的地区差异(Guo等,2016),这些差异多被归结于同期的产业集聚、制度与政策、教育水平、失业率、FDI等因素的影响(陈刚,2015;Guo等,2016)。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倾向于从更深层次的“基础性原因”去解释经济活动在地区间的发展差异(Spolaore和Wacziarg,2013),并将这种“基础性原因”归结为两类:自然地理禀赋和历史事件的影响(Redding等,2011)。例如,沿海的自然禀赋条件确实是造成一些地区获得先发优势的重要原因(赵子乐、林建浩,2019),水稻种植方式是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创业“南盛于北”的原因之一(张博、范辰辰,2021)等。然而,比自然禀赋更重要的是特殊的历史事件,比如对外开放。陈钊(2007)指出,对外开放才是驱使沿海-内陆的地理禀赋差异转化为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两次明显的对外开放过程。与备受瞩目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改革开放(1978年至今)相比,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口岸开埠虽是在西方列强武力威迫下的无奈之举,但同时也是中国被卷入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历史转折点,对理解中国近现代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对这一事件长期影响的研究还相对匮乏。事实上,由于近代口岸的开埠源自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可以视为外生的准自然实验(梁若冰,2015;李嘉楠等,2019),其研究对于理解对外开放的长期影响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因此,本文基于《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的开埠口岸数据(1842—1912年)、《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年)》的近代创业活动数据(1842—1927年),以及中国第一、二、三次经济普查的现代创业活动数据(2004—2013年),以具有沿海沿江(包括长江和珠江的干流和支流)条件的110个城市作为分析样本,研究对外开放对经济活动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在同样沿海沿江的地理禀赋条件下,近代开埠口岸的存在不仅对近代地区的创业活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更对所在城市的现代创业活动产生持续的促进作用,即使经历了近代一系列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这一作用也仍然没有消失。同时,这种对外开放的长期影响作用并不仅局限于开埠口岸所在城市,更扩散到了周边地区,且在不同的距离度量方法和阻隔因素的影响下仍然稳健。最后,本文还发现开放通过对创业文化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对地区创业活动产生持续的促进作用。

本文的学术贡献有以下几点:第一,从对外开放对经济活动的长期影响出发,研究了在同样沿海沿江的地理禀赋条件下,近代口岸开埠这一历史事件对地区经济活动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丰富了开放对地区发展长期作用的理解;第二,发现对外开放对地区创业活动的长期影响并不仅局限于开埠口岸所在城市本身,同样也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溢出效应,并且这种溢出效应在长期的发展

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显著,弥补了现有文献对于开放的长期溢出效应的研究空缺;第三,分析了对外开放对地区经济活动产生长期影响的内在机制,即通过影响地区的创业文化和人力资本,地区的对外开放对地区创业活动产生了持续且深远的影响;第四,从“基础性视角”对创业的地区差异做出了解释,发现一些特定的历史事件及其引发的地区文化和人力资本的差异,是造成地区创业活动差异的重要原因,这为理解我国的地区创业活动分布,改变创业活动的路径依赖,激发各地创业潜能提供了理论支撑;第五,从历史的视角加深了有关对外开放重要性的认识,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区发展战略等开放性政策可能对缓解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现状、推进中西部地区持续发展做出的贡献提供了经验和证据。

二、近代开放与中国地区创业活动

(一)近代开放与地区发展

早在一百年前,Marshall(1920)就认为地区经济活动的分布存在多个稳态,而特定的历史事件会造成地区从一个发展稳态向另一个稳态的转变,从而对地区发展产生长期的、持续的、巨大的影响(Minniti,2005;Redding等,2011)。对外开放就是这种特殊的历史事件之一。近年来多项研究证明,主动或被动的对外开放都会对地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Acemoglu等,2005;Jia,2014)。

中国近代的开放始于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通商口岸的被迫开放。在此之前,中国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社会发展稳态已延续数千年。而通商口岸的开放一方面将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另一方面也使国外的先进生产力得以在口岸及其腹地城市发展壮大,继而对地区的发展稳态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并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产生了一系列的深远影响(吴松弟,2015)。

由于外国势力对中国国情了解有限,所以在开埠口岸的选择上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此外,由于中国政府并不情愿开放通商口岸,因此很多开埠口岸事实上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中心。沿海沿江几乎是通商口岸选择的唯一考量。历史地区人口规模等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开埠口岸的选择均不产生显著影响(Jia,2014;Wang等,2021)。而正是这种选择的随机性为本文深入研究对外开放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当前有限的关于近代开埠口岸的研究仍主要聚焦于开放对近代经济活动带来的短期影响方面(梁若冰,2015;林鑫,2017;李嘉楠等,2019)。也有一些研究证实口岸的开埠会通过建立外部联系、缩小文化和制度的差异而对地区的外贸和对外投资产生长期的影响作用(Long等,2019;张川川等,2021)。Jia(2014)是极少见的聚焦于近代开放对国内现代经济发展产生的长期影响的研究,其发现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曾经在近代经历过开埠的口岸城市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方面都优于历史上的非口岸城市,为对外开放对地区发展的长期影响提供了佐证。然而,由于该文关注宏观的经济运行情况,很难从微观的机制上解释这种对外开放对经济活动产生长期持续影响的内在机制。因此,本文从创业活动这一微观经济行为入手,研究开放对地区经济活动的长期影响作用。

此外,近代对外开放不仅促进了口岸市场的繁荣,通过将内地的农副产品和加工产品进行出口,并将进口的“洋货”输入内地,与口岸城市保持着密切联系的腹地同样受到了口岸开埠的深刻影响(吴松弟,2015)。李嘉楠等(2019)的研究表明,口岸的开埠显著地促进了1818—1919年口岸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市场整合。林鑫(2017)的研究则发现口岸开埠通过带动周边地区的近代人力

资本发展,最终推动了 20 世纪初期口岸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随着近代开埠口岸成为历史,当年的开放对周边地区发展的溢出效应是否能够持续至今?这个问题目前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

(二)近代开放与中国地区创业活动的机制分析

梁若冰(2015)的研究已经发现,近代通商口岸的开埠确实对同期的地区创业活动(1842—1916 年)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本文认为这种影响并不是短暂的。Nunn(2020)指出,地方文化、人力资本、社会制度等因素都是历史事件产生长期影响的传导路径。在中国,从近代到现代经历了多次战争和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出现了巨大改变,创业活动甚至一度中断。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代开放还能够对现代经济活动产生持续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文化和人力资本这类持续性因素的影响。通过对地区文化和人力资本的塑造,对外开放这一历史冲击可能会对地区的创业活动形成长期的影响。

首先,对外开放带来的是地区创业文化的改变。创业文化指地区层面与创业活动相关的规范、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North, 1994),它可以通过增强创业合法性(Wyrwich 等, 2016)和建立促进创业活动的榜样效应(Andersson 和 Koster, 2011)来促进区域创业活动。就中国而言,这两种机制都至关重要。中国素有“重农轻商”的传统。Cochran(1980)曾指出,在中国衡量一个商人成功的标志就是他自己或者其后代不再是商人。但是随着口岸城市的对外开放,现代化公司和工厂的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确立,在口岸城市诞生了中国第一批现代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取得的巨大的财富使得创业文化逐步被社会所认可,提高了创业活动的合法性。此外,通过模仿和学习,现代的创业技能得以在地区内积累和传承(Fritsch 和 Wyrwich, 2014),从而形成了地区的创业文化。而文化是地区的黏性因素,大量研究证明文化具有很强的代际传承性和持续性特征(Yang 和 Zhang, 2022)。因此,通过影响地区的创业文化水平,历史上的对外开放会对现代的创业活动产生长期影响。

其次,近代口岸的开放会通过吸引外来人口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对地区的创业活动产生长期的影响。前人的研究已经证明,地区特殊的产业结构和政策(Obschonka 等, 2018)会对地区的人口结构产生影响。Jia(2014)的研究则发现对外开放带来的更好的经济发展机会极大地吸引了其他地区的人口,特别是外省的人口,这其中也包括大量高素质的人口。同时,口岸开放引入了新式的教育,通过开办教会学校,培育了大批适应现代工业化生产的人才(林矗, 2017),也通过科学期刊等近代科学传播的方式提高了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张妍等, 2021)。由于人力资本在空间的集聚具有很强的持续性(Andersson 和 Koster, 2011; 夏怡然、陆铭, 2019),因此,城市的开放会通过吸引外来人口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对地区经济活动产生持续的影响。

最后,虽然历史因素通过影响地区制度而对地区的发展产生长期影响的机制已被广泛证实(Acemoglu 等, 2005; Nunn, 2020),但也有研究认为,与变化缓慢的文化和人力资本相比,制度的变化更加频繁,因此很难作为历史因素长期影响的机制(Williamson, 2000)。历史上中国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历史因素对个别地区造成的影响很难在中央集权的环境下对广泛的地区产生长期的影响作用,更不用提在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中得以维系。Long 等(2019)和 Wang 等(2021)的研究就发现,近代口岸开埠并未对地区的制度产生长期的影响作用。鉴于相关研究在这一机制上存在争议,本文也同时就制度机制的作用进行了检验。

三、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已有研究及本文的回归结果均发现,沿海沿江是影响近代口岸开埠的唯一要素^①(Jia, 2014; Wang 等, 2021),因此本文选取沿海岸线、沿长江和沿珠江(含干流和支流)的 110 个城市作为分析样本,其中包含 37 个开埠口岸所在城市和 73 个非开埠口岸所在城市。此研究样本的设定为缓解近代开埠口岸的内生性问题提供了可能。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近代开埠口岸,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2001)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严中平等,2012)统计,1842—1912 年(鸦片战争后至中华民国成立)拥有开埠口岸的城市被定义为近代开埠口岸,取值为 1,样本中非开埠口岸所在城市取值为 0。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8 册 清时期)》(谭其骧,1987),将近代城市对应到当前地级市。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近代开埠前口岸城市与其他城市在创业活动方面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②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 1842—2013 年的地区创业活动,通过新建企业率^③(Andersson 和 Koster, 2011; Fritsch 和 Wyrwich, 2014)进行度量。

第一,近代创业数据来源于《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杜恂诚,1991)。考虑到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和 1911 年辛亥革命这两大分水岭式的历史事件,将近代企业建立时期划分为 1842—1895 年、1896—1911 年和 1912—1927 年三个时间段。近代新建企业率定义为时间段内每一年的每百万人新建企业数量的均值。近代人口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曹树基,2001)。在近代新建企业中,商办企业占比超过九成,表明了地区自发创业的活跃程度。

第二,现代创业数据来源于 2004 年、2008 年和 2013 年中国第一、二、三次经济普查。为了准确反映地方新建企业增量,即创业活动,本文仅选取 2004 年、2008 年和 2013 年当年新注册企业数量,将现代新建企业率定义为每万就业人数新建企业数量,就业人数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本文的控制变量分为三个类别,包括影响口岸选择和创业活动的地理和历史变量,以及影响现代创业活动的现代控制变量。

在历史变量方面,第一,丝绸和茶叶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开埠口岸一般会坐落于拥有丰富丝绸和茶叶资源的地区,因此本文引入历史丝绸或茶叶生产区的虚拟变量,数据来源于《明清农业史资料:1368—1911》(陈树平,2013);第二,以每万人所拥有的教堂数(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1987)来代表外国文化的接受程度;第三,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 年)是对中国近现代地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本文引入在 1851—1864 年人口减少的城市虚拟变量(曹树基,2001),以衡量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第四,大运河是公元 960 年以来唯一连接中国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和农业中心的水路,它虽在晚清时期已失去运力,然而,历史上经济繁荣的城市(如杭州、扬州)仍然位于大运河沿岸,本文通过控制到大运河最近距离的对数排除开埠

① 限于篇幅,近代开埠口岸选择的回归结果未汇报,留存备案。

② 限于篇幅,近代开埠口岸城市与其他城市创业活动的比较结果未汇报,留存备案。

③ 本文采用劳动力市场法进行新建企业率的度量,即使用劳动力人数对新建企业数量进行标准化,这也是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普遍采用的方法。由于近、现代创业活动对应年份的劳动力人数较难获取,本文分别选取总人数和就业人数进行相似替代。

城市选择经济发达城市的可能,数据来源于 CHGIS;第五,由于中国在 1842 年之前是一个农业社会,与农民的产出密切相关的 1820 年土地税可以作为反映区域繁荣程度的指标,因此本文引入人均土地税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收集于《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 2008);第六,本文引入近代人口密度(曹树基, 2001)用以反映城市规模和聚集(Fritsch 和 Wyrwich, 2014)。

在现代控制变量方面,第一,与近代一致,本文引入现代人口密度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第二,在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经济特区逐渐遍布全国,因此本文选择 1992 年以前开放的经济特区形成虚拟变量,以控制第二次对外开放过程可能对创业活动产生的影响;第三,引入与经济结构和创业活动有关的产业结构(Fritsch 等, 2019),以第二产业占 GDP 比例衡量;第四,收入变量既可以视为体现市场潜力的需求变量,也可以看作与创业资本相关的供给变量(Andersson 和 Koster, 2011),因而本文引入职工平均工资来探究收入因素在中国情景中所扮演的角色,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且取对数处理。

在地理变量方面,本文控制了可能会对口岸的开埠和创业活动的产生造成影响的地理控制变量,如城市的纬度、经度和海拔高度(取对数),数据来源于 CHGIS。

四、计量结果分析和讨论

(一)近代开埠口岸对创业活动的影响

1. 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的模型如下:

Ent_{it} = α + βport_{it} + ∑_{t=1842}²⁰¹³ θ_tX_i × I_t + γZ_{it-1} + I_t + I_p + ε_{it} (1)

其中,Ent_{it}是城市*i*在*t*年的创业活动,由于近代和现代创业活动有一定的差别,为消除计量单位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运用了标准化后的值进行回归,且在回归中进行了取对数处理(下同)。port_{it}表示城市*i*在*t*年是否为近代开埠口岸所在城市。X_i是一组不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包括全部地理变量和历史变量,本文参考 Jia(2014)和梁若冰(2015),构造这些变量与时间固定效应的交乘项,以充分体现该控制变量随时间变化的效应。Z_{it-1}表示一组随时间变化的现代控制变量,均取一期滞后数据。I_t和 I_p分别表示年份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同时,本文选择在城市层面进行聚类标准误分析。

从表 1 第(1)~(3)列可以看出,近代的开放无论对近代还是现代的地区创业活动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从第(2)列可以看出,近代开埠口岸所在城市的近代每百万人新建企业数量比非口岸城市多 29%,而第(3)列的系数表示近代开埠口岸所在城市的现代每万就业人数新建企业数量比非口岸城市多 33%,这与 Jia(2014)的结论相似,即近代开埠口岸所在城市的人均 GDP 相比其他城市高约 20%~40%。

从表 1 第(4)~(9)列的截面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近代口岸开埠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几乎全部正向显著,再次表明地区开放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持续存在。这种影响在现代表现出很强的稳健性,即使在控制了一系列现代经济发展变量,包括改革开放的重要影响之后,现代创业活动三个截面的影响仍显著为正,表明近代口岸开埠对现代地区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表 1 近代开埠口岸对创业活动的影响

变量	地区创业活动								
	全样本	近代	现代	截面回归					
	1842— 2013 年	1842— 1927 年	2004— 2013 年	1842— 1895 年	1896— 1911 年	1912— 1927 年	2004 年	2008 年	2013 年
	(1)	(2)	(3)	(4)	(5)	(6)	(7)	(8)	(9)
近代开埠口岸	0.288 *** (0.070)	0.291 *** (0.087)	0.328 *** (0.109)	0.00149 (0.0255)	0.331 ** (0.136)	0.279 *** (0.0947)	0.233 ** (0.108)	0.220 *** (0.0733)	0.265 * (0.147)
地理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历史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现代变量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023 (3.039)	-1.185 (2.244)	-8.739 (6.395)	-1.044 (0.772)	-2.592 (2.705)	-2.379 (3.694)	-11.29 * (6.107)	-23.61 *** (3.887)	6.335 (7.970)
样本量	549	282	265	94	94	94	90	93	82
R ²	0.899	0.509	0.675	0.310	0.458	0.568	0.784	0.822	0.470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系数未汇报,留存备索。下同。

2. 工具变量回归

内生性是困扰本文研究的重要问题。虽然本文已经把研究的样本限定在具有相似地理和发展条件的沿海沿江城市,但是仍不排除一些特殊的历史因素会同时对近代口岸开埠和创业活动产生影响。例如,历史上经济发达的城市可能被选择为近代开埠口岸。在这种情况下,近、现代活跃的创业活动可能是历史上经济繁荣的体现,而不是近代开埠口岸的贡献。鉴于此,本文进一步引入工具变量回归方法以期获得稳健的结果。

本文引入常关这一虚拟变量作为近代开埠口岸的工具变量(张川川等,2021;张妍等,2021)。17世纪常关的建立主要出于军事考虑,与经济发展水平无关(Jia,2014),但它是外国势力决定近代开埠口岸位置的关键考虑因素(李嘉楠等,2019)。排他性检验的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常关和1775—1910年的人口、到大运河的距离、丝绸和茶叶产区等历史上表示地区繁荣度的指标,及农业生产的适宜度等指标均不相关,①表明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因此,常关可以作为近代开埠口岸的工具变量。

表2第(1)、(3)、(5)列中常关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常关与近代口岸开埠的选址高度相关,表2中的各项统计量也证明了常关是近代开埠口岸的合适工具变量。②第(2)、(4)、(6)列中的系数表明近代开埠口岸所在城市的新建企业率仍显著高于其他城市。

① 限于篇幅,该回归结果未汇报,留存备索。
② Anderson canon. corr. LM 统计量(p 值 = 0.0000)拒绝了识别不足的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表 2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地区创业活动					
	1842—1927 年		2004—2013 年		1842—2013 年	
	(1)	(2)	(3)	(4)	(5)	(6)
近代开埠口岸		0. 777 *** (0. 241)		1. 002 *** (0. 204)		0. 963 *** (0. 174)
常关	0. 238 *** (0. 0626)		0. 440 *** (0. 0653)		0. 329 *** (0. 0476)	
地理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历史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现代变量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2. 621 (2. 858)	0. 937 (2. 795)	0. 320 (2. 932)	- 6. 806 * (4. 026)	- 2. 128 (2. 509)	2. 686 (3. 099)
样本量	282	282	265	265	549	549
R ²		0. 344		0. 572		0. 865
识别不足检验		16. 220		45. 578		50. 006
弱工具变量检验		14. 524		45. 283		47. 902

3. 稳健性检验

(1) 替代性变量

作为对基准回归中近代开埠口岸二元变量的补充,本文首先引入近代口岸开埠时长进行稳健性检验。与 1842 年第一批开放的五个口岸(上海、厦门、广州、宁波、福州)相比,1910 年最后一批开放的三个口岸(牡丹江、昆明、曲靖)在开放时间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本文构建了近代开埠口岸时长变量,衡量口岸从开埠到 1943 年近代口岸体系废除之间的时间跨度。表 3 第(1)列工具变量的结果表明,口岸开埠时长每增加 10 年,现代新建企业率增加约 15.1%。

同时,本文进一步引入开埠口岸的规模进行稳健性分析。近代开埠口岸在规模上有很大的差异,上海作为最大的口岸,1928—1937 年平均年贸易额达到 8.19 亿海关两,而最小口岸的贸易额还不到 100 万海关两。本文用 1928—1937 年口岸的平均贸易额来定义近代开埠口岸规模,①数据来源于《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2001)。结果如表 3 第(2)列所示,近代开埠口岸的规模越大,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越深刻的影响。

最后,本文进一步通过“企查查”获取的 2000—2019 年的新建企业数量(用就业人数标准化)作为现代创业活动的度量,并匹配了对应的控制变量。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利用该数据来度量现代地区创业活动进行的回归也得到了稳健结果。

① 除了贸易额之外,利用船舶吞吐量和税收值衡量的口岸规模结果相似。本文也同时收集了 1877—1937 年的数据,得到了相似的稳健结果。

表 3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现代地区创业活动					
	经济普查数据(2004—2013 年)				企查查数据(2000—2019 年)	
	口岸替代性变量		改革开放的影响		创业活动替代性变量	
	(1)	(2)	(3)	(4)	(5)	(6)
近代开埠口岸时长	0.0151 *** (0.00291)					
近代开埠口岸规模		0.0587 *** (0.0121)				
近代开埠口岸			1.002 *** (0.204)	0.773 *** (0.223)	0.668 *** (0.0875)	0.481 *** (0.0956)
<i>FDI</i>				0.121 *** (0.0386)		0.0833 *** (0.0128)
地理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历史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现代变量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关工具变量	29.246 *** (4.076)	7.190 *** (1.075)	0.440 *** (0.0653)	0.379 *** (0.0673)	0.412 *** (0.0266)	0.370 *** (0.0274)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7.527 ** (3.803)	-8.012 ** (3.912)	-6.806 * (4.026)	-5.979 * (3.622)	-1.719 (1.441)	-1.148 (1.347)
样本量	265	256	265	265	1264	1264
R ²	0.615	0.598	0.572	0.653	0.679	0.717

(2) 竞争性假说

始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是对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产生持续影响的重要事件,也会对现代地区创业活动产生影响。本文在基础回归中已经引入了经济特区的虚拟变量,这里进一步控制改革开放引起的重要经济活动,即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的对数进行衡量。从表 3 的第(4)、(6)列可以看出,*FDI* 的系数显著为正,证实了现代开放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但同时可以看出,近代开埠口岸的系数虽有所减小,但仍然显著,说明即使考虑了现代改革开放的影响,近代开放仍然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与改革开放带来的有利政策、贸易等直接的影响相比,近代口岸开放带来了工业化的种子,通过影响创业文化和人力资本这类黏性机制对现代创业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近代开埠口岸的溢出效应

1. 基准回归

近代开埠口岸城市对周边城市的溢出效应可能存在两个方向:一方面,通过从其他地区吸引

投资和劳动力产生负向溢出效应(以邻为壑效应);另一方面,基于知识扩散和市场可达性的提升而产生的正向溢出效应。Alder 等(2016)发现经济特区对周边地区的 GDP 水平有正向溢出效应, Li 和 Han(2019)则发现历史开埠口岸对现代人口和经济增长有正向溢出效应,张川川等(2021)也验证了通商口岸在外商投资和贸易角度具有辐射效应。本文将进一步探究近代开埠口岸对近现代创业活动的溢出效应。参考 Alder 等(2016)、Li 和 Han(2019)的设定,近代开埠口岸溢出效应的回归模型如下:

$$Ent_{it} = \alpha + \beta_1 port_{it} + \beta_2 \ln Dist_{it} + \sum_{i=1842}^{2013} \theta_i X_i \times I_t + \gamma Z_{it-1} + I_t + I_p + \varepsilon_{it}$$

(2)

其中, $Dist_{it}$ 为各城市到最近开埠口岸的距离(除开埠口岸所在城市本身,取对数)。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利用了根据经纬度计算的直线距离进行度量,数据来源于 CHGIS。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在引入最近开埠口岸距离变量后,近代开埠口岸这一变量的系数仍然显著。然而,表 4 第(1)列的结果显示,使用到最近开埠口岸直线距离计算的溢出效应在对近代创业活动的影响中没有得到体现。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考虑了更贴近现实的历史上城市和开埠口岸之间的铁路距离和水路距离。其中,铁路的修建被认为是通商开埠之后对城市之间联结方式的最重要的改变,同时也是开埠口岸可以产生长期影响的重要机制(Wang 等,2021)。本文计算了城市到开埠口岸之间的最短近代铁路距离(1903—1936 年)。此外,还计算了到最近开埠口岸的最短水路距离,数据来源于 CHGIS。从第(2)、(3)列可以看出,只有到最近开埠口岸的水路距离显著为负,表示到开埠口岸所在城市的水路距离越短,越利于人和货物的流通,从而有利于创业活动的产生。而铁路距离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考虑到当时的水路价格相对铁路要低很多,即使铁路修建投入运营,水路仍为口岸城市与腹地相连的主要交通运输方式(Wang 等,2021)。而第(4)、(5)列的结果表明,考虑到现代创业活动的情况下,近代开埠的溢出效应稳健性较强。从第(4)列的系数可以看出,到开埠口岸的距离每近 10%,地区新建企业率高 1.06% 左右。

表 4 溢出效应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地区创业活动				
	1842—1927 年			1842—2013 年	
	(1)	(2)	(3)	(4)	(5)
近代开埠口岸	0.316 *** (0.0918)	0.442 ** (0.190)	0.297 *** (0.080)	0.319 *** (0.0697)	0.288 *** (0.071)
最近开埠口岸直线距离	-0.0666 (0.0802)			-0.106 * (0.0593)	
最近开埠口岸铁路距离		-0.0138 (0.105)			
最近开埠口岸水路距离			-0.0544 * (0.028)		-0.0661 * (0.039)

续表 4

变量	地区创业活动				
	1842—1927 年			1842—2013 年	
	(1)	(2)	(3)	(4)	(5)
地理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历史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现代变量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706 (3.813)	12.452 (11.734)	0.208 (2.019)	2.106 (3.512)	0.651 (3.242)
样本量	282	44	282	549	549
R ²	0.514	0.700	0.515	0.901	0.900

注：基于铁路数据年份，这里仅在一个时间截面上进行回归。

2. 进一步分析

为了获得开埠口岸对腹地溢出效应的更为稳健的结果，本文在进一步分析中引入距离变量的多种度量方式，同时考虑阻隔因素的影响。

(1) 距离度量

首先，本文分析了基于上海和广州的加权距离。上海和广州不仅是第一批开埠口岸的所在城市，还分别为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贸易中心（吴松弟，2018），因而其对沿海沿江各城市的影响程度较为深远。本文借鉴在贸易领域广泛应用的引力模型，利用口岸规模和距离的倒数进行加权运算。其次，本文考虑到半径内口岸数量，分别选取 150km、300km 和 500km 作为度量半径（Alder 等，2016；李嘉楠等，2019），分析各城市半径内（除本身外）口岸数量对地区创业活动的长期影响。

(2) 阻隔的作用

在考虑溢出作用的同时，各城市与最近开埠口岸间的种种阻隔也是影响开埠口岸溢出效应的关键因素。基于林建浩和赵子乐（2017）的研究，本文考察了以下四种阻隔的影响：文化阻隔：按照各城市与最近开埠口岸所在城市（除本身外，下同）属于同一方言片为 0，不同方言片为 1，不同方言区为 2，不同方言大区为 3 进行赋值（刘毓芸等，2015）；行政阻隔：各城市与最近开埠口岸所在城市当前属于同一省份为 0，不同省份为 1；地形和流域阻隔：根据王静爱和左伟（2010），各城市与最近开埠口岸所在城市属于同一地形区（流域）为 0，不同地形区（流域）为 1。

结果发现，首先，基于上海和广州的加权距离对现代创业活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其次，半径在 150km 以内每多 1 个口岸，创业活动增长约 8%，半径在 300km 以内每多 1 个口岸，创业活动增长约 5%，说明半径越小的圈内，口岸溢出效应的边际效应越大；最后，除行政阻隔外，文化、地形和流域阻隔均没有对近代开埠口岸的长期溢出效应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只有行政阻隔与距离的交乘项为正显著，即减弱了近代开埠口岸的长期溢出效应，说明各城市与其最近开埠口岸所属省份不同会受到一定的制度和市场等因素的限制，使得开埠口岸带来的人口和货物流动、知识溢出和制度变革受到了阻碍。^①

① 限于篇幅，上述估计结果未汇报，留存备案。

五、机制分析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近代口岸的开埠不仅对当时的地区经济活动产生了影响,更对当前的地区创业活动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为什么上百年前的地区开放仍会对当前地区经济活动产生持续的影响?在 Nunn(2020)的基础上,本文将其归结于两个路径:(1)创业文化;(2)人力资本。另外,本文也同时证明了 Nunn(2020)所提出的制度机制并不能成为中国背景下历史开放对地区经济活动产生长期影响的路径。

(一)创业文化

文化通常是历史事件产生持续影响的重要路径(Nunn,2014),然而创业文化的抽象性和内生性使其界定和度量存在一定困难(Yang 和 Zhang,2022)。本文分别使用流行病学(Epidemiological Approach)的研究方法(Fernandez,2009)和创业型人格(Fritsch 等,2019)的研究方法揭示近代口岸开埠对地区创业文化影响机制的存在。

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是通过研究流动人口的表现对地区特殊的文化进行识别。一般认为流动人口脱离了与原属地之间的经济和制度联系,只保留了文化的特征。因此,在控制了流入地的经济特征之后,来自不同地区的流动人口在相同的流入地所表现出的不同的创业倾向可以作为原属地创业文化存在的最好证据。通过这样的研究方法,本文试图证明近代开埠口岸的存在对地区创业文化的长期影响作用。其中,基于2014年和2016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CLDS),本文将14岁时的居住地和现住地不一样的被调查者视为流动人口。被访者14岁时的居住地视为原属地,而现在的居住地视为流入地,研究其原属地是否为近代开埠口岸对其在现在居住地的创业选择的影响。定义职业类型为雇主和自雇的被调查者为创业者,赋值为1,其他为非创业者,赋值为0。同时,本文还进一步将样本范围缩小到流入地为非口岸城市的流动人口,以进一步反映原属地的创业文化对企业活动的影响。^①

除了流动人口创业行为以外,来自同一籍贯地的高管在企业经营方面的特殊表现也可以被认为是地方创业文化的体现(赵子乐、林建浩,2019)。^②基于此,本文收集了8322个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2012—2019年)的籍贯所在地,并匹配了这些高级管理人员对应企业的主要绩效指标,即会计利润率(ROE,净利润/平均净资产),取整个地级市的均值进行度量,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

从表5第(1)~(3)列可以看出,在控制了一系列有关创业的个体变量和流入地经济变量后,来自历史上存在开埠口岸城市的流动人口有较高的创业倾向,高级管理人员有更高的经营绩效。说明近代口岸开埠对地区创业文化产生了持续且深远的影响,在当地人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即使其离开原属地,仍然有较高的成为创业者的倾向和较好的创业绩效,证明了创业文化的存在。

在创业型人格方面,借鉴大五人格的分类和界定方法对地区创业型人格进行度量。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微观数据,在问卷中筛选适合大五人格的问题,对其进行标准化后求得

①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这一意见。

②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离差平方和,①获得分指标和总人格指标。其中,分指标“外向性”、“严谨性”和“开放性”被认为是有利于创业的正向指标,而“顺同性”和“神经质”为逆向指标(程虹、李唐,2017)。本文共收集了38737名被调查者的数据,并利用其户口所在地对应近代开埠口岸城市。从表5第(4)列可以看出,来自近代开埠口岸所在城市的个体表现出更强的创业型人格。这种人格特质的内在驱动提高了当地人成为创业者的可能性,并持续地促进创业活动。

(二)人力资本

近代开埠口岸可以通过引入新式教育体系和吸引有技能的人的方式促进当地的人力资本积累,由于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黏性(夏怡然、陆铭,2019),近代开埠口岸对近代和现代的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都将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首先,在近代的人力资本方面,口岸开埠之后科举制度废除,由传教士引入的基础教育兴起,现代教会学校注重科学技术的学习,从而孕育了适合工业社会的新一代人才(林矗,2017;Long等,2019),本文统计各地区1901—1920年的初、高级小学生比例以代表近代人力资本水平,数据来源于《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下卷)》(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1987);其次,在现代方面,本文以1984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专业从业者人数占比作为改革开放后地区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最后,本文计算了与现代创业活动同期的大学及本科以上人口占比,以上两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从表5的第(5)~(7)列可以看出,近代开埠口岸显著促进了不同时代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表明通过提高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近代开埠口岸对地区的创业活动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三)制度

为了研究近代口岸开埠可能对制度造成的影响,本文选取《政府治理、投资环境与和谐社会——中国120个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世界银行,2007)中的政府有效性排名,该指标被认为主要反映了地方政府的管理绩效。表5第(8)列的结果表明,历史开放对于现代制度环境的影响不显著。即与其他城市相比,近代开埠口岸城市在政治管理绩效方面并没有相对靠前的排名。再次表明,与文化和人力资本这些变化缓慢的因素相比,变化频繁的制度很难成为历史事件产生长期影响的机制(Williamson,2000)。

表5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创业文化				人力资本			制度
	流动人口创业		高级管理 人员绩效	人格				
	全样本	流入地为 非口岸城市 样本	ROE	总指标	近代小学生数 占比(log)	1984年工程师以上人数 占比(log)	现代大学生数 占比(log)	政府有效性排名 (相对指标)
	(1)	(2)	(3)	(4)	(5)	(6)	(7)	(8)
近代开埠口岸	0.0633 *** (0.0219)	0.0718 ** (0.0363)	0.0712 * (0.0366)	0.0265 *** (0.00601)	1.135 *** (0.304)	0.570 * (0.322)	0.852 *** (0.248)	3.470 (2.223)

① 创业型人格的计算方式为:Entr_persfit = (E_i - min(E))² + (C_i - min(C))² + (O_i - min(O))² + (max(A) - A_i)² + (max(N) - N_i)²(E: Extraversion 外向性;C: Conscientiousness 严谨性;O: Openness 开放性;A: Agreeableness 顺同性;N: Neuroticism 神经质)。限于篇幅,指标选取留存备案。

续表 5

变量	创业文化				人力资本			制度
	流动人口创业		高级管理 人员绩效	人格				
	全样本	流入地为 非口岸城市样本	ROE	总指标	近代小 学生数 占比(log)	1984 年工程 师以上人数 占比(log)	现代大 学生数 占比(log)	政府有效 性排名 (相对指标)
	(1)	(2)	(3)	(4)	(5)	(6)	(7)	(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常数项			0.0980 (1.873)	1.730 *** (0.0473)	0.0500 (14.70)	12.88 (12.45)	-4.350 (9.655)	-22.58 (111.5)
样本量	3074	1205	92	38737	86	81	279	57
R ²	0.0776	0.0932	0.568	0.069	0.593	0.416	0.520	0.455

注: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机制分析中也同时引入了工具变量的分析方法,限于篇幅,留存备索。

六、结 论

本文从近代口岸开埠这一代表性历史事件和近、现代创业活动这一代表性微观经济活动入手,研究开放对地区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时间维度上,本文证明了近代开埠口岸会显著促进近代和现代地区创业活动的产生,且这一作用在考虑到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后仍然存在,表明地区开放会成为地区发展的“历史遗产”,并持续对地区的经济活动产生长期深远的影响。空间维度上,本文发现近代开埠口岸不仅对其所在城市的创业活动有积极影响,还会促进其腹地创业活动的发生,并且这种溢出效应具有较强的长期稳定性。此外,本文在溢出效应分析中进行的有关距离和阻隔的稳健性检验也得出了预期结果。最后,本文探究了近代开放产生长期影响的机制。其中,近代开埠口岸可以通过促进地区创业文化的产生,以及塑造近代和现代人力资本,从而长期影响创业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多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社会重建与利益博弈、经济繁荣与贫富悬殊的重重发展矛盾。本文从“历史照进现实”的视角加深了对外开放重要性及其长期影响机制的理解,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区发展战略等开放性政策对缓解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现状、推进中西部地区持续发展做出的贡献提供了思路,为新冠疫情背景下连通国内国外双循环提供了经验和证据。

参考文献:

1.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2. 陈刚:《管制与创业——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管理世界》2015 年第 5 期。

3. 程虹、李唐:《人格特征对于劳动力工资的影响效应——基于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7 年第 2 期。

4. 陈树平:《明清农业史资料:1368—19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5. 陈钊:《政府行为、市场整合、工业集聚与地区差距——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学逻辑》,《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2期。
6. 杜恒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7. 李宏彬、李杏、姚先国、张海峰、张俊森:《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
8. 李嘉楠、代谦、庄嘉霖:《开放、市场整合与经济空间变迁:基于近代中国开埠的证据》,《世界经济》2019年第9期。
9.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华书局2008年版。
10. 梁若冰:《口岸、铁路与中国近代工业化》,《经济研究》2015年第4期。
11. 林鑫:《通商口岸、新式教育与近代经济发展:一个历史计量学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1期。
12. 林建浩、赵子乐:《均衡发展的隐形壁垒:方言、制度与技术扩散》,《经济研究》2017年第9期。
13. 刘毓莹、徐现祥、肖泽凯:《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倒U型模式》,《经济研究》2015年第10期。
14. 世界银行:《政府治理、投资环境与社会和谐——中国120个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15.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清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
16. 王静爱、左伟:《中国地理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10年版。
17. 吴松弟:《中国近代经济地理 第一卷:绪论和全国概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8. 吴松弟:《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变迁中的“港口—腹地”问题阐释》,《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19. 夏怡然、陆铭:《跨越世纪的城市人力资本足迹——历史遗产、政策冲击和劳动力流动》,《经济研究》2019年第1期。
20.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21. 张博、范展辰:《稻作与创业:中国企业家精神南北差异的文化起源》,《财贸经济》2021年第6期。
22. 张川川、张文杰、李楠、杨汝岱:《清末开埠通商的长期影响:外商投资与进出口贸易》,《世界经济》2021年第11期。
23. 张妍、冯晨、白彩全:《开放、知识传播与长期人力资本积累》,《世界经济》2021年第2期。
24. 赵子乐、林建浩:《海洋文化与企业创新——基于东南沿海三大商帮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9年第2期。
2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
26.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27. Acemoglu, D., Johnson, S., & Robinson, J. A.,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3, 2005, pp. 546–579.
28. Alder, S., Shao, L., & Zilibotti, F., Economic Reforms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a Panel of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21, No. 4, 2016, pp. 305–349.
29. Andersson, M., & Koster, S., Sources of Persistence in Regional Start-up Rates-Evidence from Sweden.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 11, No. 1, 2011, pp. 179–201.
30. Cochran, S., *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1930*.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31. Fernandez, R., Cultur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Beliefs, Work, and Fertilit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 1, No. 1, 2009, pp. 146–177.
32. Fritsch, M., & Wyrwich, M., The Long Persistence of Regional Levels of Entrepreneurship: Germany, 1925–2005. *Regional Studies*, Vol. 48, No. 6, 2014, pp. 955–973.
33. Fritsch, M., Obschonka, M., & Wyrwich, M., Historical Roots of Entrepreneurship-Facilitating Culture and Innovation Activity: An Analysis for German Regions, *Regional studies*, Vol. 53, No. 9, 2019, pp. 1296–1307.
34. Guo, Q., He, C., & Li, D.,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The Role of Localisation and Urbanisation Economies. *Urban Studies*, Vol. 53, No. 12, 2016, pp. 2584–2606.
35. Jia, R., The Legacies of Forced Freedom: China's Treaty Port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96, No. 4, 2014, pp. 596–608.
36. Li, J., & Han, X., Bayesian Lasso for Spatial Durbin Error Model with Smoothness Prior: Application to Detect Spillovers of China's Treaty Port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77, 2019, pp. 38–74.
37. Long, C., Murrell, P., & Yang, L., Memories of Colonial Law: The Inheritance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Location of Joint Ventures in Early-Reform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58, 2019, 101284.
38. 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20.

39. Minniti, M., Entrepreneurship and Network External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57, No. 1, 2005, pp. 1 – 27.
40. North, D. C.,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1994, pp. 359 – 368.
41. Nunn, 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 2, 2014, pp. 347 – 401.
42. Nunn, N.,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cience*, Vol. 367, No. 6485, 2020, p. eaaz9986.
43. Obschonka, M., Stuetzer, M., Rentfrow, P. J., Shaw-Taylor, L., Satchell, M., Silbereisen, R. K., Potter, J., & Gosling, S. D., In the Shadow of Coal: How Large-Scale Industries Contributed to Present-Day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115, No. 5, 2018, pp. 903 – 927.
44. Redding, S. J., Sturm, D. M., & Wolf, N., History and Industry Location: Evidence from German Airport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93, No. 3, 2011, pp. 814 – 831.
45. Spolaore, E., & Wacziarg, R., How Deep Are the Roo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51, No. 2, 2013, pp. 325 – 369.
46. Wang, Z., Yang, H., & Zhang, X. N., History Matters: The Effects of Chinese Ports from 170 Years Ago on Entrepreneurship Today. *Regional Studies*, Vol. 55, No. 4, 2021, pp. 630 – 644.
47. Williamson, O. E.,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Stock, Looking Ahea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8, No. 3, 2000, pp. 595 – 613.
48. Wyrwich, M., Stuetzer, M., & Sternberg, R., Entrepreneurial Role Models, Fear of Failure, and Institutional Approval of Entrepreneurship: A Tale of Two Region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Vol. 4, No. 3, 2016, pp. 467 – 492.
49. Yang, H., & Zhang, X. N., Persistence of Culture: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of Origin Contributes to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https://doi.org/10.1007/s11187-022-00699-2>, 2022.

Legacy from History: The Effects of Historical Ports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1842 – 2013)

YANG Hua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433)

ZHANG Xinni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433)

WANG Zhe (Fudan University, 200433)

Abstract: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Over the past 40 years, driven by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 has created a “miracle” that has amazed the world. The GDP has increased by more than 30 times, and both the imports and exports, and the FDI have achieved a new level. It’s proven that the opening-up policy can not only exert a short-term impact on trade volume and income growth, but also leave a long-term legacy by causing a hug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e. In modern history (1840 – today), China have experienced two obvious opening-up processes. Compared with the high-profile and hugely successful reform and opening-up process (1978 – present), the opening of historical ports after the Opium War in 1842 was a forced opening-up process under the threat of the Western powers, but marked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and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profound impact of opening up on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ng-term evolution.

Therefore, based on the data of port openings (1842 – 1912) in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Historical Archives, the data of moder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1842 – 1927) in National Capitalism and the Old Chinese Government (1840 – 1937), and China’s first, second and third economic censuses data on moder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2004 – 2013), this paper selected 110 cities located along the coast or rivers (including the main streams and tributar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Pearl River) as samples to study the

long-term impact of opening-up on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with the same geographical endowment conditions along the coast or rivers, the existence of historical ports had not only significant impact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 the modern times, but also long-term impact on today's entrepreneurship. This study then adopts Changguan (historical customs) as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of the historical ports to conduct an endogenous analysis. Furthermore, we introduced alternative measurements and settings of independent and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considered the facto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robustness tests. The consistent results in the endogenous analysis and robustness tests all support the conclusions in the baseline analysi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long-term impact of opening up is not limited to the local, but has spilled over to the surrounding areas. And this finding is quite robus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distance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blocking factors. Further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opening of historical ports can continue to promote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rough its impact on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and human capital.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hree ways. First, it focuses on the long-term impact of the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on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simultaneously studies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impact of the opening of historical ports on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Secondly,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long-term impact of opening up on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s not limited to the port city, but also has a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surrounding areas, which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process. Thir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long-term impact of opening up on regional economic activities: through the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and human capital, the opening of the region to the outside world has had a sustained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Finally,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regional divergences in entrepreneurship from a "fundamental perspective", and finds that some specific historical events and the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culture and human capital caused by them are important reasons for regional divergences i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is paper have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the study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its long-term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that "history matters".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in 1978,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but also faced multiple problems, including the widening gap among regions. If we only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st forty years, it is difficult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reform and opening-up. However,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current economic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opening, and provides experience and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opening-up policies such a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Free Trade Zone (FTZ)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o alleviate im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Second, this paper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reveals historical roots for the differences in current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Only by understanding these roots can we propose the direction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policy intervention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Keywords: Historical Port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Spillover Effect,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Human Capital

JEL: L26, N95, R12

责任编辑:波 若